



主编 文昊

丝绸之路

中国新疆

古代艺术

主 编 穆舜英

副主编 祁小山 张 平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主编 文昊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

(汉英对照)

THE ANCIENT ART IN XINJIANG, CHINA

主编 穆舜英 副主编 祁小山 张平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版

Xingjiang Fine Arts and Photograph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汉英对照/穆舜英主编,祁小山、张平副主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469-5835-4

I. ①新… II. ①穆… III. ①美术史—新疆—古代—画册 IV. ①J120.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3062 号

选题策划:于文胜

插图:张华君 王 博 哈斯也提

摄影:祁小山 王 露 冯 斐

地图绘制:杨晓梅

英文翻译:肖小勇 朱 新 张 川 刘文锁

责任编辑:柳用能 吴晓霞 迪娜·迪力木拉提



封面设计:李瑞芳

版式制作:李瑞芳

责任复审:于文胜

责任决审:李贵春

责任印制:刘伟煜



主编 文昊

书 名 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汉英对照)

本册主编 穆舜英

本册副主编 祁小山 张 平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www.xjdzxy.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 230 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5835-4

定 价 198.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前言

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西部边疆省区,国土陆地面积为 165 万平方千米。在其北面和西面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接壤,是中国通向中亚、西亚、南亚,甚至远达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门户,古代丝绸之路就曾经经过这里。由于它地处亚洲腹地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不仅使这一地区成为沟通旧大陆东西各国的重要通道,而且也曾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即黄河流域古代文明、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及地中海区域古代文明)的交流荟萃之地,这就使得这一地区的古代艺术文化呈现出一幅色彩缤纷、绚丽多姿的画面。

西域历来就是中国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古老的部落、民族在此活动,如在天山以北草原上有著名的游牧部族塞人(西方史料中称为塞克或斯基泰人)、月氏、匈奴和乌孙等,在天山以南各沙漠绿洲有羌人、楼兰人、车师人、焉耆人、龟兹人、疏勒人、于阗人,以及后来活跃在天山南北的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吐蕃人、黠戛斯人、回鹘人和蒙古人等等。至今在新疆境内仍居住着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 13 个主体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虽然都有其本身历史发展的兴衰变迁,但都为西域文明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各自不朽的艺术作品。

艺术是人类为追求生存和发展,探索“尽善尽美”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历史上人类创造的极为丰富的各种艺术品都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产物。西域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中心。古代众多民族创造的精美绝伦的古代艺术品,不仅是古代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世界古代文明的创造和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寻觅西域艺术的精华,将在人们面前展示出西域艺术发展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及其不朽的艺术魅力。

西域的古代艺术发展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至七千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这时候的人类已从原始打击粗重石器的自然状态下解放出来,学会了使用间接打击法和剥制法来制造更精巧的细小石器,有了细石镞、细石矛和细石叶石器(细刃片石器),出现了弓箭、长矛和石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这标示着原始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重大革新,

并且有了原始畜牧业和种植业,也开始出现了原始艺术的萌芽。人类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漫长岁月中,首先是与自然斗争,为争取生存而奋斗,其追求生活美的意愿,也只能是孕育于这一斗争之中,故原始艺术品往往也是生产工具,实用与欣赏的审美性融为一体,这是原始艺术表现的重要特征。

在今新疆石器时代遗址中,人们在哈密七角井细石器遗址和乌鲁木齐柴窝堡细石器遗址中曾发现一颗石核石器,其底部打制成锥状体、柱状体和船底形体等,呈现出一定的几何形状,这些特征不仅具有划分时代意义,而且表现了人类在追求着形状的变化,注意了“美”的体现,它透视了古代西域原始艺术的启端。在新疆的罗布泊洼地和吐鲁番盆地的细石器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一颗制作极为精致的“桂叶形”细石镞(图1)和石矛(图2),其外观制作得与桂花树叶极为相似,镞或矛两端呈尖形,中间略鼓,有立体感。更令人感叹的是镞(矛)表面被通体加工精雕细琢出的凹凸面,似片片鱼鳞,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显示了一种原始的神秘力。当然这些细石镞镞面修琢成鱼鳞状,首先是为了加强石镞的杀伤力,但这一枚枚桂叶形石镞也无疑地凝结了古人探索美的心愿。它们是原始石器艺术中的精品。

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五六千年),人类在石器制作中又出现了新技术——磨光技术,磨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石器的典型特征。在新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磨光石镰、磨制石斧、玉斧和琢制的石球等,表面光滑细腻,尤其是用羊脂玉磨制的石斧(图4),更是加工精细,晶莹光洁,几乎可以和近代玉器媲美。而遗址中发现的石球(图3)制作规整,琢制匀称,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雕凿石器的工艺水平。

在原始石器艺术中,作为独立艺术品出现的是在木垒四道沟发现的一件石祖(图334),雕凿异常逼真,这是对男性生殖力的崇拜的物质形象表现。石祖的出现表示了古代人对人的自身力量的认识和追求,也是石器艺术中写实风格的作品。这里要说明的是在一些新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发现了少量小铜刀和小铜片,有些学者认为这些遗址可能已进入青铜文化时期。

新疆原始石器艺术具有在粗犷中透露出一种神秘色彩的美的风格,这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和人的力量的追求和探索。

新疆历史进入金石并用时期和青铜文化时期(距今三四千年),艺术的发展已出现了地区的差异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这个时代的遗址在全疆各地都有发现,在罗布泊的孔雀河北岸古墓沟古墓地,出土了丰富的石、骨器和草编器等文物,人们发现极有特点的木雕和石雕半身女俑像(图295),以及用芦苇、草秆、香蒲草叶编织的带花纹的篓筐,其时代为距今3800年左右。这些木、石雕半身人像,整体雕凿刀法很粗犷,但却细致地雕凿出修长的脸庞,头顶的毛织帽,甚至其毛线的纹路也清晰可辨,女俑头后凿出辫状的短发髻,胸部双乳突出。这些在罗布泊古墓沟地区发现的木、石雕半身人像,为探索古墓沟人的形象、习俗及其原始崇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独有的艺术珍品。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墓沟墓区出土的文物中没有发现陶器,也不见大型

青铜器,仅在墓区发现过两个很小的铜卷片。

较古墓沟石器要晚,在距今二千六七百年,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新疆的许多地方发现了以出土彩陶为特征的考古文化。这类遗址多分布在天山东部的哈密地区和吐鲁番盆地,近年来在焉耆盆地(含轮台和库车地区)也有重要发现。在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曾有少量发现。这批彩陶器从器形的制作,色泽的调配,花纹的布局和纹样图案的变化方面看,都具有各个地区或不同民族的独特艺术风格。如在哈密盆地发现的一批双耳彩陶罐(图 22.25.26),在红色陶衣上绘黑色花纹,满身涂彩,红黑色泽调配十分醒目。其花纹图案有:蔓藤枝叶纹、三叶草纹、水波 S 纹,还有菱形纹、横竖线纹、垂幛纹和填以折线的倒三角纹。在吐鲁番盆地及在这一地区的天山谷地发现的彩陶器、典型器形是单耳彩陶罐,有红衣黑彩或红衣红彩,大部分满身涂彩,花纹图案多见的是弧形三角纹、网状纹、涡卷纹和针叶纹。在焉耆盆地的和静、轮台和克孜尔水库地区发现的彩陶器,典型器形则是单耳带流陶罐(杯),其装饰图案的布局,常见的是在罐的颈部或口腹部的一侧绘有一条斜或横的宽带(图 36),在宽带内绘饰不同的图案花纹,大部分为红衣红彩,也有在红衣上部分涂白黄色彩,再涂红或紫彩。其花纹图案常见的有方棋盘格纹、山形纹、网状纹和变化多端的动物纹、几何纹等。其中有两件彩陶罐,图案花纹极为罕见,一件是在和静察吾呼沟古墓出土的单耳带流彩陶罐,在罐的颈部绘有一横排跪伏的双峰骆驼(图 20),细线轻描,笔触细腻,形象极其逼真。另一件是在轮台群巴克古墓中发现的单耳带流彩陶罐,在罐的腹部的一个侧面绘有一幅人头侧面像(图 27),古代的彩绘工只用寥寥数笔,用横竖斜线就勾画了出来,这种运用素描技巧的熟练程度是令人惊叹的。在伊犁河流域发现的彩陶器,多见的是高颈弧腹的彩陶壶和矮腹圆底的彩陶钵,红衣红彩,满身涂彩,常见花纹有虚实方格、菱形格、曲折纹、网状纹和针树叶纹。将上述新疆的彩陶文化与周缘地区的比较,便可发现哈密地区的彩陶器,从器形特征极其花纹布局,与甘肃河西地区的火烧沟彩陶文化极为相似,这一地区的彩陶艺术风格似乎受到河西地区古代文化的影响。但在新疆的吐鲁番、焉耆等地发现的彩陶,则无论从器形还是图案花纹方面看,都与甘肃河西地区和中亚、西亚地区发现的彩陶文化其主体完全不同,明显地具有本身独有的艺术特点。从彩陶的图案花纹上,还可以看到其艺术风格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如其山形纹、网状纹和变形鸟纹等,明显受到新疆盆地高山地形和渔猎放牧生活的影响。艺术的形象往往来源于生活的直观,这是写实风格形成的根源。新疆彩陶文化艺术的发展是新疆古代艺术中的一枝灿烂的花卉,而这些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彩陶艺术其不同的艺术风格正反应了新疆古代多民族的特点和艺术的地区性、多样化的发展。

与上述彩陶艺术大致同时代或较早的历史时期中,还有两类艺术,一类是新疆各大山系中发现的岩石刻画,从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到南部的昆仑山、阿尔金山都有发现,这些为世人瞩目的岩画,大部分分布于高山牧场、中低山区及牧民转场的路线的附近岩壁上,是新疆古代游牧民族的艺术文化遗存。岩画采用粗线条阳刻手法

凿刻在岩石壁上,也有少量彩绘岩画发现于洞穴内,岩画主题多见动物画、放牧画和狩猎画,画中常见的是鹿、山羊、马、狼、牛。其原始质朴的画风显露在画面之上。岩画艺术中最令人惊异的是1987年在呼图壁县西南天山中康家石门子发现的大幅生殖崇拜岩画,位于东经 $86^{\circ}19'$,北纬 $43^{\circ}51'$,海拔1500米处,画面凿刻在距地面约10米的岩壁上,面积达120多平方米,整幅画面布满男女人物像,或站或卧,或衣或裸,总数二三百人,画面有人物舞蹈的场面和男女交媾的形象,采取了夸张的手法,突出了画的主题。其画面之大、人数之众,为新疆岩画之冠,是一幅罕见的大幅岩画(图155、156、157、158),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具有重大的社会和艺术价值。关于新疆岩画的断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大部分岩画可能早到铜石并用时期,一部分则可能在公元前前后,但也有的可能晚到12、13世纪的蒙古时期,延续时间较长。

另一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伊犁河流域发现的青铜器艺术品。其中最突出的是新源县发现的一组铜器,有铜武士俑、对虎铜环、对翼兽铜环和昭苏县发现的人面蛇足铜方盘等,都是罕见的青铜艺术珍品。铜武士俑(图74),通高40厘米,重约3千克,采用了浇模焊制法,武士头戴尖顶弯钩大檐帽,单膝跪地,上身裸露,下身围短裙,两手在胸前做空握执物状(物已不见)。武士双目前视,脸部神态庄重端凝,造型极其生动,是古代少数民族的形象,这是目前在新疆境内仅有的一件。与铜武士俑同时发现的对虎铜项圈(图76),对翼兽铜项圈(图77),也是新疆境内所仅见。虎、兽造型粗犷,其环的直径为40厘米,环圈粗8厘米,可作为项圈戴在脖颈处,似是古代部落酋长的权力象征,均为古代部落酋长的权力象征,均为浇模制成。在吐鲁番盆地南山阿拉沟古墓中发现的双兽方盘高座铜器(图75),铜方盘中铸两只小狮,盘下为一喇叭形高方座,为浇模焊接,相类似之物在中亚地区也曾发现,可能是古代塞人的遗存,已经有了高水平的冶炼铸造技术,同时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新疆北部草原青铜文化的艺术风格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新疆伊犁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似与中亚、西亚的草原青铜文化互相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年在天山地区,还陆续发现了一批双耳深腹高足铜甗,一般通高50~60厘米(图79·80·81),体形较大,显然浇灌铸造这样大型铜器,要求具更高的技术。与此类相似的器物在中亚、西亚地区也有发现,是一种实用器皿。古人在制作这铜甗时,普遍在双耳和口沿部分做了艺术加工,有的加铸成蘑菇状,是一种纯粹装饰美的表现。

除此之外,新疆境内还发现了一批具有浓厚鄂尔多斯草原艺术风格的兽纹铜饰牌,主要发现地点在哈密、巴里坤、吐鲁番、木垒等地。兽纹铜饰牌制作均极为精巧,在一块长形或圆形的铜牌上,用雕刻镂空的技法,铸刻出野猪、虎、马的形象,其中的野猪纹透雕团形饰牌(图88),野猪搏马纹铜饰牌(图83),以及包金虎形铜牌(图87)等等,都是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它们都是新疆古代青铜艺术品中佼佼者。

新疆原始石器艺术、彩陶艺术、岩画艺术、青铜艺术等众多的艺术类型,表现了多姿多彩的艺术传统,充分反映了新疆历史上的多民族性。各个民族在新疆这一宽广的

历史舞台上,创造和留下了自己不朽的艺术作品。

公元前2世纪,中国西汉王朝派张骞首次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又于公元前60年在今新疆的轮台地区设立政权机构“西域都护府”。历史的发展变化,使得古代新疆的文化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极为灿烂的画面。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伴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的直接交流。代表中亚、西亚、南亚甚至地中海地区的优秀文化艺术流传到了新疆,并通过新疆传播到中国的内地,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也随着商业交通的发展,流传到了西方。人们在新疆境内发现了许多公元前后汉朝时的丝织工艺品,同时也发现了具有浓厚西方文化风格的毛织工艺品,如在古代丝路重镇楼兰遗址发现的东汉王朝时期的丝织品,这的确是一批难得的古代丝织工艺精品,虽然距今已达两千年的岁月,发现时也已成了残片,但仍然可以看出东汉丝织工艺的高超水平。这些锦绸用各种不同的颜色的丝线织出繁缛的蔓藤枝叶纹,在围绕着的云纹中夹织各类珍禽猛兽和吉祥语,这些被神化的虎、龙、豹等走兽和鸭、鸟、孔雀等飞禽图案,和吉祥语“永昌”“长寿明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图261·262·263)等均夹织在图案中,与其他花纹汇为一体,织造异常精致。这些典型的东汉丝织工艺品,是古代东方文化的优秀代表,东汉丝织品在民丰尉犁等地也有发现。人们在已发表的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的两件羊毛(图267、270)制品的图案中,则明显地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该墓中发现的一件“人首马身”羊毛,其图案花样设计完全取材于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另一件“武士像”羊毛,武士头扎白额带,深目高鼻,明显具有白种人的特点,其侧面立竖一长矛。这两件毛织品都是古代丝路上罕见的珍品,其图案花纹也值得人们注意。另棉织品是在民丰尼雅遗址中发现的,是一件织有花纹的蓝色棉布(图260),其左面的图案花纹是裸体菩萨像,右侧是一条龙的尾巴,龙的头部已残缺不见。棉织品最早起源于东非,后流传到印度、中国,而佛教传入中国当在公元一世纪之后,故这件棉织品反映的织造工艺图案已受到南亚古印度文化的影响。东西方文化艺术之间的交互渗入影响,是新疆古代文化艺术的特点之一。

公元二三世纪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越来越渗入新疆境内各地,对新疆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新疆南疆沙漠边缘各绿洲地区分布的古楼兰鄯善文化、古焉耆文化、古龟兹文化、古于阗文化、古疏勒文化和古高昌文化等,其主要内涵无不与佛教文化有关。考古学家在这些地区发现了许多佛教石窟和佛寺遗址,新疆的佛教石窟艺术,成为新疆中世纪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佛教艺术品主要是壁画和塑像,包括佛像和供养人像。在这两个方面人们也可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在若羌米兰佛寺中发现的有翼天使壁画(图178),在于田、拜城、焉耆等佛寺中发现的各类供养人泥塑头像,其形象或是突眼张口,或满头卷发,或深目高鼻,梳有发髻(图379),明显具有中亚和西亚人的特征。但是新疆佛教艺术的主要方面还表现了新疆本地区的传统艺术风格,如著名的克孜尔岩画(图429·430),这是目前在新疆境内保存壁画数量最多的石窟。壁画的题材以弘扬佛教为主,但表现手法和风格却是新疆的艺术传统。人们从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看到了这些特色,如壁画中绘的大量佛本生故事画、佛传故事画、说法图、菩萨像等,内容是佛教的,但所绘佛和菩萨的形象却具有古龟兹人的特征。至于壁画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世俗因缘故事画,各类供养人画,那就完全是本地人的形象了。又如从绘画技巧来看,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以线条勾画出人物,突出表现了人物强壮的骨骼和肌肉,同时着色采用了晕染法,使画面增加了凹凸的立体感。绘画技法上所使用的这种线描法和凹凸法就是古代著名的新疆画家尉迟跋质那父子创立的“屈铁盘丝”的绘画技法传统。再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布局来看,克孜尔石窟的画师们采取了用菱形格画面,将一组组佛本生故事,绘于一个又一个菱形格画面中(图 194),更令人感到叹服的是每个菱形格画面的边缘都以山树来装饰,让人感到其画面既有区分又有联系,这种布局是克孜尔石窟在壁画艺术中独创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保存了大量佛本生故事画,据调查其类型有 80 种之多,是世界上保存佛本生故事画最多的地区。克孜尔石窟在窟形建筑上也独创了“龟兹石窟形”。新疆境内石窟佛教艺术的研究,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是打开古代时期新疆艺术大门的钥匙,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到了中国隋唐时期,新疆古代艺术文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在木雕、泥塑、版画、纸画、石刻和织造工艺等方面,都受到了中原隋唐先进文化艺术的影响,出现了新疆古代艺术发展的繁荣时期。人们在吐鲁番地区就曾发现大批具有盛唐艺术风格的艺术品,有织锦、绢画、泥塑、彩绘陶器等等,如在吐鲁番古墓中发现的唐朝“仕女弈棋图”绢画(图 210),系在素面绢绸上绘一贵妇正手执棋子,神情专注棋盘,做欲下未下之状。此妇女身着红地蓝黄白小花的织锦衫裙,发梳高髻,额贴金黄,脸涂脂抹粉,画风细腻,是典型的盛唐艺术风格。与此相似的还有“舞伎图”绢画(图 214),“侍马图”绢画(图 216),都是极其珍贵的绢画工艺品。在此批古墓中还出土了大量彩色泥塑,其中彩色打球俑(图 393),打球手骑住一匹奔驰的骏马上,手扬球棒正做击球状,形象生动逼真,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牵驼俑”“武士俑”“带帷帽盛装女骑马俑”“舞女俑”“宦官俑”(图 385),还有“彩绘天王踏鬼木俑”(图 328),“人首豹身镇墓兽”(图 395)等,真是色彩斑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有意思的是这批泥塑形象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有的泥塑如舞女俑和宦官俑,仅头部和帽冠是泥塑,彩绘脸部,其身軀部分以草把为骨,两臂用纸条卷成,外穿织绸衫裙袍,舞女还身披织锦或彩纱披巾(图 382)。这种工艺制作技术应是古高昌地区独创的。

在与此历史阶段大致相当的时期中,新疆民族艺术文化也有独创性的发展。在新疆辽阔的草原地区有一批相当数量的突厥石人,这些用整块高达 1~2 米的砂岩石凿刻成的石人,有的比真人还大,其中典型的有温泉阿尔卡特石人(图 341),在整块砂岩石上面雕凿出一个高约 1.9 米的石人,脸庞宽阔,颧骨高,上唇蓄八字胡,身着翻领大衣,腰部束带,右手持酒杯,举至胸前,左手按刀剑,脚蹬皮靴,雕凿刀法粗犷有力,俨然是一位屹立在草原上的威严的武士。草原石人,有凿刻全身的,也有十分简陋的,只凿刻出头部的,中国史料中记载突厥人有用石人作墓碑的埋葬习俗。故草原地区的石人有

相当部分应是突厥艺术文化的遗存,是新疆民族艺术中的不朽珍品。古代回鹘人的艺术文化主要发现在今吐鲁番和吉木萨尔地区,是西州回鹘汗国时期的遗存,从目前已发表的材料看主要的代表作是在柏孜克里克佛教石窟和北庭故城四大寺中发现的一批供养人壁画,身着盛装的回鹘男女贵族手持吉祥花束成群地排列绘在石窟寺院墙面上。贵族男子都着窄袖长袍,腰上悬挂各类配件(图 231),但这些贵族男子,头上所戴的帽子各有不同,有桃形,有扇面形,还有山叉戟形,女贵族则头戴花冠。在北庭故城四大寺发现的回鹘王和王妃供养画,也都是各人手持一束吉祥花,王冠为桃形冠,王妃头戴高桃形花冠,其形态庄严高贵,富有王者风度。在回鹘王画同一地点发现的《王者出行图》(图 248),画面战旗林立,战马跳跃,其动态与前幅画中的静态恰成对比,这都是古代回鹘艺术文化中的珍品。令人感到十分有意思的还有他们两人所穿的锦袍,其锦面花纹为联珠环形,与波斯萨珊王朝所盛行的联珠纹饰十分相似。古代回鹘艺术从人物造型及其艺术风格,都可看到中原唐朝和中亚地区艺术风格的影响。可惜的是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回鹘人壁画已流散到国外,人们现在只能从已发表的画册上窥其真迹。

新疆地区的艺术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教传入之后,显著地受到了伊斯兰艺术文化风格的渗透和影响。突出的是至今在新疆境内仍可见到的那些宏伟壮丽的建筑,如吐鲁番市苏公塔(图 443)、霍城县的秃黑鲁·帖木儿麻扎(图 422)、喀什市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图 438)和阿帕·霍加麻扎(香妃墓)(图 440),这些建筑都用彩色琉璃砖瓦装饰,外墙和穹窿形塔顶在阳光照射下熠熠发光,显得庄严肃穆,富丽堂皇,这是一批独具艺术风格的建筑纪念物。

艺术是人类社会思维文化的形象表现,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和民族文化的特征,因此艺术与人类历史中哲学、宗教、美学、雕塑和绘画工艺等都有密切的联系,研究艺术、透过艺术,可以使人们了解过去和展望未来。绚丽多彩的新疆艺术,是中国多民族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艺术文化艺苑中一朵奇葩。

穆舜英

于乌鲁木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3.06.16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1
Preface	8
图版	17
Photo	17
石器	18
Stone Implement	19
陶器	22
Pottery	23
铜器(附金银器)	40
Bronze	41
岩画	60
Rock Carving	61
绘画	68
Painting	69
编织	98
Woven Ware	99

木器	114
Wooden Article	115
石雕	126
Stone Statue	127
泥塑	136
Clay Sculpture	137
玉琢	156
Jade	157
建筑	162
Architecture	163
参考资料	173
References	173
图版说明	174
Photo Index	214
地图	260
Map	260

前言

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西部边疆省区,国土陆地面积为 165 万平方千米。在其北面和西面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接壤,是中国通向中亚、西亚、南亚,甚至远达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门户,古代丝绸之路就曾经经过这里。由于它地处亚洲腹地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不仅使这一地区成为沟通旧大陆东西各国的重要通道,而且也曾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即黄河流域古代文明、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及地中海区域古代文明)的交流荟萃之地,这就使得这一地区的古代艺术文化呈现出一幅色彩缤纷、绚丽多姿的画面。

西域历来就是中国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古老的部落、民族在此活动,如在天山以北草原上有著名的游牧部族塞人(西方史料中称为塞克或斯基泰人)、月氏、匈奴和乌孙等,在天山以南各沙漠绿洲有羌人、楼兰人、车师人、焉耆人、龟兹人、疏勒人、于阗人,以及后来活跃在天山南北的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吐蕃人、黠戛斯人、回鹘人和蒙古人等等。至今在新疆境内仍居住着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 13 个主体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虽然都有其本身历史发展的兴衰变迁,但都为西域文明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各自不朽的艺术作品。

艺术是人类为追求生存和发展,探索“尽善尽美”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历史上人类创造的极为丰富的各种艺术品都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产物。西域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中心。古代众多民族创造的精美绝伦的古代艺术品,不仅是古代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世界古代文明的创造和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寻觅西域艺术的精华,将在人们面前展示出西域艺术发展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及其不朽的艺术魅力。

西域的古代艺术发展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至七千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这时候的人类已从原始打击粗重石器的自然状态下解放出来,学会了使用间接打击法和剥制法来制造更精巧的细小石器,有了细石镞、细石矛和细石叶石器(细刃片石器),出现了弓箭、长矛和石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这标示着原始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重大革新,

并且有了原始畜牧业和种植业,也开始出现了原始艺术的萌芽。人类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漫长岁月中,首先是与自然斗争,为争取生存而奋斗,其追求生活美的意愿,也只能是孕育于这一斗争之中,故原始艺术品往往也是生产工具,实用与欣赏的审美性融为一体,这是原始艺术表现的重要特征。

在今新疆石器时代遗址中,人们在哈密七角井细石器遗址和乌鲁木齐柴窝堡细石器遗址中曾发现一颗石核石器,其底部打制成锥状体、柱状体和船底形体等,呈现出一定的几何形状,这些特征不仅具有划分时代意义,而且表现了人类在追求着形状的变化,注意了“美”的体现,它透视了古代西域原始艺术的启端。在新疆的罗布泊洼地和吐鲁番盆地的细石器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一颗制作极为精致的“桂叶形”细石镞(图1)和石矛(图2),其外观制作得与桂花树叶极为相似,镞或矛两端呈尖形,中间略鼓,有立体感。更令人感叹的是镞(矛)表面被通体加工精雕细琢出的凹凸面,似片片鱼鳞,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显示了一种原始的神秘力。当然这些细石镞镞面修琢成鱼鳞状,首先是为了加强石镞的杀伤力,但这一枚枚桂叶形石镞也无疑地凝结了古人探索美的心愿。它们是原始石器艺术中的精品。

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五六千年),人类在石器制作中又出现了新技术——磨光技术,磨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石器的典型特征。在新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磨光石镰、磨制石斧、玉斧和琢制的石球等,表面光滑细腻,尤其是用羊脂玉磨制的石斧(图4),更是加工精细,晶莹光洁,几乎可以和近代玉器媲美。而遗址中发现的石球(图3)制作规整,琢制匀称,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雕凿石器的工艺水平。

在原始石器艺术中,作为独立艺术品出现的是在木垒四道沟发现的一件石祖(图334),雕凿异常逼真,这是对男性生殖力的崇拜的物质形象表现。石祖的出现表示了古代人对人的自身力量的认识和追求,也是石器艺术中写实风格的作品。这里要说明的是在一些新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发现了少量小铜刀和小铜片,有些学者认为这些遗址可能已进入青铜文化时期。

新疆原始石器艺术具有在粗犷中透出一种神秘色彩的美的风格,这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和人的力量的追求和探索。

新疆历史进入金石并用时期和青铜文化时期(距今三四千年),艺术的发展已出现了地区的差异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这个时代的遗址在全疆各地都有发现,在罗布泊的孔雀河北岸古墓沟古墓地,出土了丰富的石、骨器和草编器等文物,人们发现极有特点的木雕和石雕半身女俑像(图295),以及用芦苇、草秆、香蒲草叶编织的带花纹的篓筐,其时代为距今3800年左右。这些木、石雕半身人像,整体雕凿刀法很粗犷,但却细致地雕凿出修长的脸庞,头顶的毛织帽,甚至其毛线的纹路也清晰可辨,女俑头后凿出辫状的短发髻,胸部双乳突出。这些在罗布泊古墓沟地区发现的木、石雕半身人像,为探索古墓沟人的形象、习俗及其原始崇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独有的艺术珍品。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墓沟墓区出土的文物中没有发现陶器,也不见大型

青铜器,仅在墓区发现过两个很小的铜卷片。

较古墓沟石器要晚,在距今二千六七百年,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新疆的许多地方发现了以出土彩陶为特征的考古文化。这类遗址多分布在天山东部的哈密地区和吐鲁番盆地,近年来在焉耆盆地(含轮台和库车地区)也有重要发现。在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曾有少量发现。这批彩陶器从器形的制作,色泽的调配,花纹的布局和纹样图案的变化方面看,都具有各个地区或不同民族的独特艺术风格。如在哈密盆地发现的一批双耳彩陶罐(图 22.25.26),在红色陶衣上绘黑色花纹,满身涂彩,红黑色泽调配十分醒目。其花纹图案有:蔓藤枝叶纹、三叶草纹、水波 S 纹,还有菱形纹、横竖线纹、垂幛纹和填以折线的倒三角纹。在吐鲁番盆地及在这一地区的天山谷地发现的彩陶器、典型器形是单耳彩陶罐,有红衣黑彩或红衣红彩,大部分满身涂彩,花纹图案多见的是弧形三角纹、网状纹、涡卷纹和针叶纹。在焉耆盆地的和静、轮台和克孜尔水库地区发现的彩陶器,典型器形则是单耳带流陶罐(杯),其装饰图案的布局,常见的是在罐的颈部或口腹部的一侧绘有一条斜或横的宽带(图 36),在宽带内绘饰不同的图案花纹,大部分为红衣红彩,也有在红衣上部分涂白黄色彩,再涂红或紫彩。其花纹图案常见的有方棋盘格纹、山形纹、网状纹和变化多端的动物纹、几何纹等。其中有两件彩陶罐,图案花纹极为罕见,一件是在和静察吾呼沟古墓出土的单耳带流彩陶罐,在罐的颈部绘有一横排跪伏的双峰骆驼(图 20),细线轻描,笔触细腻,形象极其逼真。另一件是在轮台群巴克古墓中发现的单耳带流彩陶罐,在罐的腹部的一个侧面绘有一幅人头侧面像(图 27),古代的彩绘工只用寥寥数笔,用横竖斜线就勾画了出来,这种运用素描技巧的熟练程度是令人惊叹的。在伊犁河流域发现的彩陶器,多见的是高颈弧腹的彩陶壶和矮腹圆底的彩陶钵,红衣红彩,满身涂彩,常见花纹有虚实方格、菱形格、曲折纹、网状纹和针树叶纹。将上述新疆的彩陶文化与周缘地区的比较,便可发现哈密地区的彩陶器,从器形特征极其花纹布局,与甘肃河西地区的火烧沟彩陶文化极为相似,这一地区的彩陶艺术风格似乎受到河西地区古代文化的影响。但在新疆的吐鲁番、焉耆等地发现的彩陶,则无论从器形还是图案花纹方面看,都与甘肃河西地区和中亚、西亚地区发现的彩陶文化其主体完全不同,明显地具有本身独有的艺术特点。从彩陶的图案花纹上,还可以看到其艺术风格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如其山形纹、网状纹和变形鸟纹等,明显受到新疆盆地高山地形和渔猎放牧生活的影响。艺术的形象往往来源于生活的直观,这是写实风格形成的根源。新疆彩陶文化艺术的发展是新疆古代艺术中的一枝灿烂的花卉,而这些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彩陶艺术其不同的艺术风格正反应了新疆古代多民族的特点和艺术的地区性、多样化的发展。

与上述彩陶艺术大致同时代或较早的历史时期中,还有两类艺术,一类是新疆各大山系中发现的岩石刻画,从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到南部的昆仑山、阿尔金山都有发现,这些为世人瞩目的岩画,大部分分布于高山牧场、中低山区及牧民转场的路线的附近岩壁上,是新疆古代游牧民族的艺术文化遗存。岩画采用粗线条阳刻手法

凿刻在岩石壁上,也有少量彩绘岩画发现于洞穴内,岩画主题多见动物画、放牧画和狩猎画,画中常见的是鹿、山羊、马、狼、牛。其原始质朴的画风显露在画面之上。岩画艺术中最令人惊异的是1987年在呼图壁县西南天山中康家石门子发现的大幅生殖崇拜岩画,位于东经 $86^{\circ}19'$,北纬 $43^{\circ}51'$,海拔1500米处,画面凿刻在距地面约10米的岩壁上,面积达120多平方米,整幅画面布满男女人物像,或站或卧,或衣或裸,总数二三百人,画面有人物舞蹈的场面和男女交媾的形象,采取了夸张的手法,突出了画的主题。其画面之大、人数之众,为新疆岩画之冠,是一幅罕见的大幅岩画(图155、156、157、158),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具有重大的社会和艺术价值。关于新疆岩画的断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大部分岩画可能早到铜石并用时期,一部分则可能在公元前后,但也有的可能晚到12、13世纪的蒙古时期,延续时间较长。

另一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伊犁河流域发现的青铜器艺术品。其中最突出的是新源县发现的一组铜器,有铜武士俑、对虎铜环、对翼兽铜环和昭苏县发现的人面蛇足铜方盘等,都是罕见的青铜艺术珍品。铜武士俑(图74),通高40厘米,重约3千克,采用了浇模焊制法,武士头戴尖顶弯钩大檐帽,单膝跪地,上身裸露,下身围短裙,两手在胸前做空握执物状(物已不见)。武士双目前视,脸部神态庄重端凝,造型极其生动,是古代少数民族的形象,这是目前在新疆境内仅有的一件。与铜武士俑同时发现的对虎铜项圈(图76),对翼兽铜项圈(图77),也是新疆境内所仅见。虎、兽造型粗犷,其环的直径为40厘米,环圈粗8厘米,可作为项圈戴在脖颈处,似是古代部落酋长的权力象征,均为古代部落酋长的权力象征,均为浇模制成。在吐鲁番盆地南山阿拉沟古墓中发现的双兽方盘高座铜器(图75),铜方盘中铸两只小狮,盘下为一喇叭形高方座,为浇模焊接,相类似之物在中亚地区也曾发现,可能是古代塞人的遗存,已经有了高水平的冶炼铸造技术,同时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新疆北部草原青铜文化的艺术风格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新疆伊犁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似与中亚、西亚的草原青铜文化互相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年在天山地区,还陆续发现了一批双耳深腹高足铜甗,一般通高50~60厘米(图79·80·81),体形较大,显然浇灌铸造这样大型铜器,要求具更高的技术。与此类相似的器物在中亚、西亚地区也有发现,是一种实用器皿。古人在制作这铜甗时,普遍在双耳和口沿部分做了艺术加工,有的加铸成蘑菇状,是一种纯粹装饰美的表现。

除此之外,新疆境内还发现了一批具有浓厚鄂尔多斯草原艺术风格的兽纹铜饰牌,主要发现地点在哈密、巴里坤、吐鲁番、木垒等地。兽纹铜饰牌制作均极为精巧,在一块长形或圆形的铜牌上,用雕刻镂空的技法,铸刻出野猪、虎、马的形象,其中的野猪纹透雕团形饰牌(图88),野猪搏马纹铜饰牌(图83),以及包金虎形铜牌(图87)等等,都是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它们都是新疆古代青铜艺术品中佼佼者。

新疆原始石器艺术、彩陶艺术、岩画艺术、青铜艺术等众多的艺术类型,表现了多姿多彩的艺术传统,充分反映了新疆历史上的多民族性。各个民族在新疆这一宽广的

历史舞台上,创造和留下了自己不朽的艺术作品。

公元前2世纪,中国西汉王朝派张骞首次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又于公元前60年在今新疆的轮台地区设立政权机构“西域都护府”。历史的发展变化,使得古代新疆的文化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极为灿烂的画面。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伴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的直接交流。代表中亚、西亚、南亚甚至地中海地区的优秀文化艺术流传到了新疆,并通过新疆传播到中国的内地,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也随着商业交通的发展,流传到了西方。人们在新疆境内发现了许多公元前后汉朝时的丝织工艺品,同时也发现了具有浓厚西方文化风格的毛织工艺品,如在古代丝路重镇楼兰遗址发现的东汉王朝时期的丝织品,这的确是一批难得的古代丝织工艺精品,虽然距今已达两千年的岁月,发现时也已成了残片,但仍然可以看出东汉丝织工艺的高超水平。这些锦绸用各种不同的颜色的丝线织出繁缛的蔓藤枝叶纹,在围绕着的云纹中夹织各类珍禽猛兽和吉祥语,这些被神化的虎、龙、豹等走兽和鸭、鸟、孔雀等飞禽图案,和吉祥语“永昌”“长寿明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图261·262·263)等均夹织在图案中,与其他花纹汇为一体,织造异常精致。这些典型的东汉丝织工艺品,是古代东方文化的优秀代表,东汉丝织品在民丰尉犁等地也有发现。人们在已发表的洛浦山普拉古墓出土的两件羊毛(图267、270)制品的图案中,则明显地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该墓中发现的一件“人首马身”羊毛,其图案花样设计完全取材于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另一件“武士像”羊毛,武士头扎白额带,深目高鼻,明显具有白种人的特点,其侧面立竖一长矛。这两件毛织品都是古代丝路上罕见的珍品,其图案花纹也值得人们注意。另棉织品是在民丰尼雅遗址中发现的,是一件织有花纹的蓝色棉布(图260),其左面的图案花纹是裸体菩萨像,右侧是一条龙的尾巴,龙的头部已残缺不见。棉织品最早起源于东非,后流传到印度、中国,而佛教传入中国当在公元一世纪之后,故这件棉织品反映的织造工艺图案已受到南亚古印度文化的影响。东西方文化艺术之间的交互渗入影响,是新疆古代文化艺术的特点之一。

公元二三世纪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越来越渗入新疆境内各地,对新疆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新疆南疆沙漠边缘各绿洲地区分布的古楼兰鄯善文化、古焉耆文化、古龟兹文化、古于阗文化、古疏勒文化和古高昌文化等,其主要内涵无不与佛教文化有关。考古学家在这些地区发现了许多佛教石窟和佛寺遗址,新疆的佛教石窟艺术,成为新疆中世纪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佛教艺术品主要是壁画和塑像,包括佛像和供养人像。在这两个方面人们也可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在若羌米兰佛寺中发现的有翼天使壁画(图178),在于田、拜城、焉耆等佛寺中发现的各类供养人泥塑头像,其形象或是突眼张口,或满头卷发,或深目高鼻,梳有发髻(图379),明显具有中亚和西亚人的特征。但是新疆佛教艺术的主要方面还表现了新疆本地区的传统艺术风格,如著名的克孜尔岩画(图429·430),这是目前在新疆境内保存壁画数量最多的石窟。壁画的题材以弘扬佛教为主,但表现手法和风格却是新疆的艺术传统。人们从